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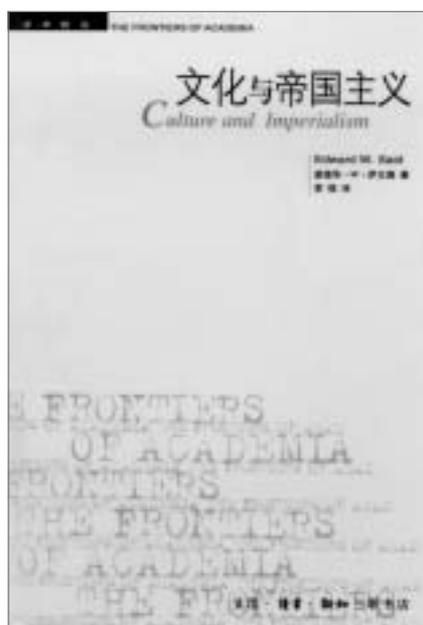
些，在晚清風雲際會之歷史轉折關頭，德高望重的大學士如徐桐、倭仁之輩，滿足於以厭惡洋人、洋務來標榜其堅貞的道德立場，而中國早期近代化嘗試的關鍵人物如李鴻章、郭嵩燾者，則難免要忍受「名教罪人」之指責。平心而論，李、郭的道德自覺及道德使命感均遠不及徐、倭，然而，廁身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保守主義者的道德信仰不過成了「致命的自負」，反而是「離經叛道」之人對近代因素的接受沒有道德負擔，以

歷史的目光看，究竟是疏於修身的改革派、還是那些在道德上幾乎無隙可擊的衛道士，把握了正在破門而入的近代契機？歷史簡直給道德保守主義者開了一個不懷好意的玩笑——他們確信「唯一的出路就是道德重建」，在他們孜孜以求下，國家終於將其道德理想確立為意識形態正統，然而，到了晚清大變局之際，這個古老帝國卻需要進行艱難的道德意識形態「祛魅」與「脫敏」，方能融入近代化之滾滾洪潮。

道德保守主義在十三世紀之「勝利」與十九世紀中國對近代契機的拒絕，兩者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道德保守主義者們孜孜以求下，國家終於將其道德理想確立為意識形態正統，但到了晚清大變局之際，這個古老帝國卻需要進行艱難的道德意識形態「祛魅」，方能融入近代化之滾滾洪潮。

評介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

● 張興成



薩義德 (Edward W. Said) 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北京：三聯書店，2003）。

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學》(Orientalism) 的「緒論」中，薩義德 (Edward W. Said) 就提出要「寫一本從總體上論述帝國主義和文化之間關係的書」，這就是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文化與帝國主義》缺乏《東方學》那樣的體系性和易於把

薩義德認為，文化是「帝國主義物質基礎中與經濟、政治同等重要的決定性的活躍因素」，在高雅的審美趣味背後隱藏着更為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與支配欲望，高雅文化所散布的殖民思想常常具有更強的滲透力，更易於被廣泛接受，在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攫取殖民領土的過程中發揮了鳴鑼開道的作用。

握的理論線索，全書是由一系列演講與論文構成的「片斷的集合」，充滿了比《東方學》還多的矛盾性和難以理解的「謎團」。《文化與帝國主義》不僅延續了《東方學》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的主題，而且在以下幾個方面「對現代西方宗主國與它在海外的領地的關係作出了更具普遍性的描述」：第一，將論述的空間範圍從中東拓展到了英法的整個殖民世界，在時間跨度上也延續到了作者寫作時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最新表現；第二，在視角上與《東方學》也有所不同，從學院中進行的專業的「東方研究」和非文學形式，轉向在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都影響極大的經典文學、藝術作品，從而對帝國意識形態的「政治無意識」本質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揭示；第三，《文化與帝國主義》開拓了一個《東方學》未曾關注的主題——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書中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涉及到非殖民地化和「民族解放」問題，由此可以理解薩義德對民族主義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批判態度。

具體來看，全書共四章。在第一章裏作者提出了全書的基本闡釋框架。薩義德認為人們對現代帝國歷史中文化的特殊作用認識得很不夠，文化不是高於日常生活的、遠離政治和利益的、純粹的、審美的東西，像詩歌、小說與哲學這樣的「高雅文化」與骯髒的帝國主義暴力和殖民佔有絕非毫無關係。事實上，文化是「帝國主義物質基礎中與經濟、政治同等重要的決定性的活躍因素」，在高雅的審美趣味背

後隱藏着更為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與支配欲望，高雅文化所散布的殖民思想常常具有更強的滲透力，更易於被廣泛接受，在十九世紀歐洲列強攫取殖民領土的過程中發揮了鳴鑼開道的作用。帝國的 formed 是一個「帝國、地理與文化」相互交織的歷史進程，現代帝國文化與其控制的土著、領地文化之間存在着相互重疊與滲透的權力關係。因此，薩義德提出在解讀現代西方文化時，應該採取一種類似複調音樂的「對位閱讀法」(contrapuntal reading)，將帝國主義和對它的抵抗聯繫在一起來觀照。雖然不少作品只展示了帝國統治的一面，但通過「對位法閱讀」我們可以發現那些被作者有意排除的另一面，使我們同時意識到這些文化遺產中所敘述的宗主國歷史和那些與佔統治地位的話語相抗衡(有時是迎合)的其他歷史。如果把法國與阿爾及利亞、越南的歷史分開，把英國與加勒比海、非洲、印度等的歷史分開，而不是把它們放在一起對照研究，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現代西方的文化結構和話語形式。

全書以解讀西方文化經典為主，尤其是第二章，着重分析了英法小說家、藝術家的經典作品，如奧斯汀(Jane Austen)的《曼斯費爾德莊園》(*Mansfield Park*)、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歌劇《阿依達》(*Aida*)、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吉姆》(*Kim*)、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加繆(Camus)有關阿爾及利亞的作品等。薩義德將西方小

說的興起與「帝國霸權主義」緊密結合起來，指出小說對帝國態度、經驗和意識形態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他甚至武斷地認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幾乎在英法文化的每個角落裏，都可以看到帝國事實的種種暗示，「帝國主義和小說相得益彰，它們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甚至一談小說就非談帝國主義不可，反之亦然」。特別是英國小說，即使是像奧斯汀這樣一向被看作只關注英國鄉村紳士談情說愛、風度氣質的作家，也難逃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污染。在現代英、法小說中大量存在描寫地理空間、特別是海外世界的現象，作品中經常將宗主國的發展、主人公的境遇變遷與某個遙遠的地區連在一起。對此，薩義德提出了「態度和參照結構」(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這一闡釋模式，以探討敘事與地理空間、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從習慣於認為小說的情節與結構主要是由時間構成的，轉向對空間、地理與地點的關注。這些作品往往「把為社會所需要和授權的故事空間安排在英國或歐洲，然後通過編排、設計動機和故事的發展，把遙遠的或邊緣的世界(愛爾蘭、威尼斯、非洲和牙買加)聯繫起來」，在這精心構造的敘事框架中，充斥着關於帝國的統治、控制和利益等觀念。小說通過對這些空間的反覆描繪，潛移默化地應和與強化了西方人的帝國思想，影響了帝國歷史的形成與發展。如奧斯汀的《曼斯費爾德莊園》就是關於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空間中的遷徙與

定居的小說，曼斯費爾德莊園被奧斯汀放在橫跨兩個半球、兩個大海和四塊大陸之間的一個利害與關注的中心點。這個與遠方的殖民統治密切相聯的莊園實質上成為了帝國權威的象徵。這種描述也暗示了在當時英國一切與等級、法律和財產這樣一些高層次的東西相聯繫的價值觀，都必須堅實地建立在對領地的實際統治與佔有上面。

在第三章，薩義德集中討論了二十世紀反帝國、反殖民主義思想，這是《文化與帝國主義》中最具啟示性的部分。薩義德概括了一整套「反抗文化的主題」，既涉及到西方宗主國作家的反帝意識，也指出了帝國領地和受殖者抵抗文化中的困境與矛盾，還討論了一種典型的後殖民式寫作方式，即一些來自殖民地或邊緣地區的知識份子，以「帝國」的語言，使用一度單單為歐洲人所使用的學術與批評技巧、話語進入宗主國文化，和它打成一片，改變它，使它承認邊緣化了的、受壓制的或被遺忘了的歷史，薩義德將這稱為「駛入的航程」(the voyage in)。以這種方式，第三世界與邊緣地區的知識份子和文化不僅改變着帝國世界和觀念，而且已經成為帝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薩義德認為這表明帝國結構時代正在走向文化國際化時代，觀念不再只是出現在巴黎或倫敦了，歷史也不再是像黑格爾(G. W. F. Hegel)所認為的那樣單向地從東方走向西方，從南方走向北方了。

在歐洲與非歐洲、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二元對立結構中，對

現代帝國文化與其控制的土著、領地文化之間存在着相互重疊與滲透的權力關係。因此，薩義德提出在解讀現代西方文化時應該採取一種類似複調音樂的「對位閱讀法」，將帝國主義和對它的抵抗聯繫在一起來觀照。雖然不少作品只展示了帝國統治的一面，但通過「對位法閱讀」我們可以發現那些被作者有意排除的另一面。

薩義德將反抗文化分為兩種形式：民族主義者的反帝國主義文化和自由主義者的反帝國主義文化，提出要從狹隘的民族主義中擺脫出來，完成「後民族主義的解放」。他認為，「真正的民族主義反帝運動永遠具備自我批評精神」。民族「一旦獲得獨立，就需要有關社會與文化新的、富有想像力的觀念，以及避免舊的觀念與不公的復歸」。

抗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合法性到底何在？民族主義是否意味着非殖民化的終點和歷史歸宿？它與帝國主義的邏輯是否存在必然的差異？薩義德企圖通過重讀葉芝 (W. B. Yeats)、法農 (Frantz Fanon) 等著名反帝作家的作品與思想回答這些難題。薩義德將反抗文化分為兩種形式：民族主義者的反帝國主義文化和自由主義者的反帝國主義文化，提出要從狹隘的民族主義中擺脫出來，完成「後民族主義的解放」。他認為，「真正的民族主義反帝運動永遠具備自我批評精神」，這不是簡單地否定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動員力量對於世界各地的反西方統治、恢復本土文化傳統和政治自由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但是在這些歷史事實中，我們也看到了民族國家的獨立並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與解放，由民族主義帶來的新的分裂主義、排外主義、沙文主義、集權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等，正在重複着原來的帝國統治和壓制行為。民族「一旦獲得獨立，就需要有關社會與文化新的、富有想像力的觀念，以及避免舊的觀念與不公的復歸」。民族解放不能成為「權力置換」遊戲，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各個領域中的精英事實上容易將殖民主義力量代之以另一個以階級、宗教、利益為基礎的，並且最終成為有剝削性質的力量，這個力量以新的名義重複着舊有的殖民主義結構，成為新的「內部殖民」霸權，所以，薩義德說：「在典型的民族主義中，毫無疑問，家長式

的形象到處可見。」從思想和認知的層面來說，把本土主義立場作為抵抗和非殖民化的唯一選擇，實際上不過是接受帝國主義的遺產，接受帝國主義造成的種族、宗教和政治的分裂，因為，這種行為和帝國主義的本質主義思維是一脈相承的，歐洲中心主義、白人優越論與黑人文化自豪感、愛爾蘭主義、伊斯蘭主義、儒教主義等等都不過是把歷史交給了本質主義，而本質主義將把人類置於不斷升級的「文明的衝突」之中。因此，超越本土主義並不意味着放棄民族，而是意味着不把地方屬性看作包羅一切，不急於把自己限定在某種「特性」的範圍之內。可見，薩義德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民族的獨立」，而是真正啟蒙意義上的「人的解放」。用法農的話說，真正的「解放」「意味着從狹隘的民族意識向普遍的社會覺悟的轉變」。所以，本土主義不是唯一的選擇，薩義德希望有一個更寬容、更多元的世界前景，民族主義雖然是反抗的必由之路，但人們無法在這條道路上走到終點。

通過對反帝文化行為的分析，薩義德讓我們看到，帝國主義的形成既是歐洲擴張的結果，也是其受害者合作與不合作，以及他們本土政治運作的結果。當今世界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帝國主義的發展與延伸，法農認為，如果民族意識在其成功的時刻不迅速轉變為社會意識，它的前途就是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殖民主義政權的暴力與土著的反暴力互相制衡，並且在特殊

的同種循環中互相回應」，帝國主義雖然把權威讓給了民族資產階級，但實際上是在拓展自己的霸權，培植新的接班人，民族主義不過是在重複、擴大並製造新的帝國主義形式而已。基於此，薩義德提倡要把鬥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要求有一種「後民族主義」的理論，把批判民族主義作為終結帝國主義的另一個起點。他認為，民族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始終不能超越人的獨立與自由，「巴勒斯坦／以色列在爭取平等時，應以一個人類目標為指導，也即共存，而不是進一步的壓制與拒絕」，人權革命與民族革命是並行不悖的。

非殖民地化導致了傳統帝國主義的解體，但並不意味着帝國主義的消失，新的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形式正在改變着當今世界，所以，在最後一章裏，薩義德主要批

評了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以及與之對抗或合作的各種民族主義文化，特別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帝國主義觀念在現代傳媒等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表現，美國正在把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新形式引向未來。

《文化與帝國主義》保持了薩義德一貫的文風，以淵博的學識、恢弘的眼界、敏銳的感覺，加上激情澎湃的雄辯與清醒的學術立場，思考我們這個時代政治與文化衝突的迫切問題。他始終堅持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反對一切的本源性想像和認知策略，倡導文化之間的平等交融與相互尊重，「文化決不是一個所有權的問題，一個有着絕對的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借和貸的問題，而是不同文化間的共用、共同經驗與相互依賴的問題。這是一條普遍的準則！」

薩義德所追求的不僅僅是「民族的獨立」，而是真正啟蒙意義上的「人的解放」。他提倡把批判民族主義作為終結帝國主義的另一個起點。非殖民地化導致了傳統帝國主義的解體，但並不意味着帝國主義的消失，新的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形式正在改變着當今世界。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4年6月號、7月號

第27期 2004.6.30

吳鵬森、余君 傳統社會主義理念與農業合作化運動

楊奎松 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上)(全文版本)

牛秋實 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以劉師培和王國維為中心

曾子炳 詩歌的精神

申欣旺 「教育券」實踐——我國基礎教育投資問題研究

楊光飛 「地方合作主義」中的權力「越位」——對轉型期地方「紅頂商人」現象的一種反思

第28期 2004.7.31

楊奎松 1920-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下)(全文版本)

彭幹梓 毛澤東早期教育思想溯源

陳林 台灣民主的陷阱

陳友華 百姓眼中的社會與發展——來自中國八大城市的調查報告

瞿駿 清末地方憲政研究的問題與路徑——與傅懷鋒先生商榷